

从脱胎于经学到拓宇于文学*

——《百赋音》的价值意义与音义文献的发展演进

牟 歆

内容提要 褚诎之《百赋音》虽已散佚，但仍可从各种古注中辑出34条，其内容和注释方式均带上了明显的经学痕迹，注音也基本反映出了六朝语音的真实情况。《百赋音》的特殊价值主要是昭示文学与文学音义从经学中的独立，展现当时辞赋音义的发展水平，以及在帮助诵读理解辞赋的同时显示出音义文献由零散注音向集中展现语言现象的演进轨迹，启发了后世学者逐步建立系统的音义学说和理论。它的散佚则与唐代以后音义学与小学的混同以及韵书的出现和推广密切相关，但韵书所取代的只是音义文献记录字音的功能，音义文献随文注释或摘字为释的直观性和准确性却因其独特价值而难以被替代。

关键词 褚诎之 《百赋音》 音义

《隋书·经籍志》云“《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诎之撰。”^①这是历代书目中记载的时代最早的集部音义文献之一^②。作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百赋音》在学术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就说“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诎而忽吕忱。”^③则是书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影响力极大。陆德明《经典释文》、司马贞《史记索隐》、萧该《汉书音义》及宋祁注《汉书·扬雄传》等屡引其说，亦可知其学说在唐代及宋初仍然受到学者推崇。然而自《通志》之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等均未著录，盖亡于两宋之交。又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唐艺文志》明修宋版作《古赋音》，他本多作‘百’。”^④似乎书名又作《古赋音》，与《隋志》所载不同。这说明该书在流传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问题。事实上，《百赋音》虽佚，但其价值不容忽视，其原因就在于今已无全本可见的六朝音义文献传世，即使有敦煌残卷《楚辞音》的出现，然而时代却晚于《百赋音》。幸赖古注类书中尚有子遗，可供辑佚，我们可据以探索其体例、作用及散佚缘由，进而讨论其价值及在音义学史上的地位。

一 《百赋音》的著录及内容考索

前文已经提到了《隋书·经籍志》与明修宋版《新唐书·艺文志》对《百赋音》记载的不同。除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楚汉辞赋音义文献研究”（项目编号18CZW010）阶段性成果。

① 魏徵《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册，第1083页。

② 案：据《隋志》所载，经部的服虔《春秋左传音》、史部的应劭《汉书集解音义》等时代均早于《百赋音》。而在集部中，同时代前后还有李轨《二都赋音》以及李轨、蔡母遂《二京赋音》。

③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上册，第266页。

④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册，第5882页。

此之外,关于书的书名、作者及卷数,各种史志书目所载尚多有异说。《旧唐书·经籍志》云:“《百赋音》一卷,褚令之撰。”^①《新唐书·艺文志》为“褚令之《百赋音》一卷。”^②又《颜氏家训·勉学》云“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颜氏家训集解》,上册,第266页)则作者名褚诠。《汉书·司马相如传》标题下颜师古注曰“近代之读相如赋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竟为音说,致失本真,徐广、邹诞生、诸诠之、陈武之属是也。”^③是作者又名诸诠之。宋祁等人注《汉书》又多引作“诸诠《赋音》”,如扬雄《甘泉赋》“嵌岩岩其龙鳞”之“嵌”字,宋祁曰“诸诠《赋音》苦啣反。”^④则作者、书名又各不同。总结起来,书名有《百赋音》《古赋音》《赋音》三种名目;作者有褚诠之、褚令之、诸诠之、褚诠、诸诠五种说法;卷数亦有十卷、一卷两种记载。诸说错杂纷扰,纠缠不清。

先谈书名。姚振宗据明修宋版《新唐书·艺文志》作《古赋音》,则以为“百”当为“古”。然他本《新唐书》多作“百”,则所谓明修宋版只是孤证,且明人翻刻宋本,未可遽信。而宋祁所引作《赋音》,则可能只是省称。郑樵《通志·艺文略》所载亦作“《百赋音》一卷,褚令之撰”^⑤,与两《唐志》所载同。因此,其名恐当以《百赋音》为是。

次看作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按:宋子京校《汉书》扬雄三赋,屡引诸诠《音》,盖即此书,讹‘褚’为‘诸’,又脱‘之’字耳。”^⑥此说可参。《隋书·经籍志》除录有“《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⑦外,尚有“兼中书舍人《褚诠之集》八卷,录一卷。亡”(《隋书》卷三五《经籍志》,第4册,第1073页)的记载,则褚诠之为刘宋时人,可能官至御史兼中书舍人。其余诸说恐均是刊刻传写之误所致。

再论卷数。是书卷数从十卷到一卷,姚振宗认为此亦是“写刊之误”^⑧,可备一说。然卷数的减少也存在书中内容逐渐散佚之缘故。古书流传过程中多有类似情况,亦当考虑。

要之,《百赋音》《古赋音》《赋音》俱为一书,褚诠之、诸诠之、褚诠、诸诠、褚令之俱为一人,后文均作如此处理。

《百赋音》一书虽早已散佚,然于诸旧籍中可稽考者仍有数十条。今考《经典释文》等书确数引褚诠之之说,然有明言引自其注某赋之音者,亦有不言出之何处者。如《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郑《笺》“凡物有阴阳情欲者无不妒忌”,《经典释文》云“情欲,音欲,诸诠之音谕。”^⑨“欲”字所用太广,此即不知其音之所出者,故类此者皆不录。

现录切实可靠者如下:

1.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

① “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

梦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录《天子游猎赋》此句下司马贞《索隐》曰“褚诠音亡栋反,又音莫风反。”^⑩

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册,第2078页。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册,第1619页。

③ 班固《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册,第2529页。

④ 佚名《汉书考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册,第126页。

⑤ 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826页。

⑥ 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上册,第560页。

⑦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第4册,第1083页。

⑧ 《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第5882页。

⑨ 陆德明著,黄焯断句《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

⑩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册,第3004页。

② “磐石振崖，嵌岩倚倾。”

嵌 《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尔即死必于穀之嵌岩，是文王之所辟风雨者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曰“嵌，苦衔反，邹深生、褚诠之音《上林赋》并同。”（《经典释文》，第314页）^①

2. 扬雄《甘泉赋》

① “骈罗列布，鳞以杂沓兮，柴虬参差，鱼颡而鸟旃。”

柴虬 《汉书·扬雄传》录有此赋。宋人所撰《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②曰“‘柴’一本作‘傑’。诸诠赋傑音初绮反。”^③又《颜氏家训·名实》“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赵曦明注即引扬雄《甘泉赋》此句云“‘柴虬’，一本作‘傑僂’……萧该《音义》：‘诸诠僂音池，又音豸。’”（《颜氏家训集解》，上册，第380页）

② “是时未轸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绎绎。”

绎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诸诠赋音亦。”^④

③ “金人仡仡其承钟虞兮，嵌岩岩其龙鳞。”

嵌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诸诠赋音苦啣反。”^⑤

④ “览穆流于高光兮，溶方皇于西清。”

穆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穆，诸诠赋音株。”^⑥

⑤ “相与齐虬阳灵之宫。”

齐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诸诠云‘齐，沮谐反。’”^⑦

3. 扬雄《羽猎赋》

① “陋三王之隄薜，峤高举而大兴。”

隄 《汉书·扬雄传》录有此赋。《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隄音洽。隄，诸诠音乌隔反，一音於卖反。”^⑧

② “历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闳。”

登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登闳，韦昭曰高大也。诸诠：登，张萌反。”^⑨

③ “营合围会，然后先置虬白杨之南，昆明灵沼之东。”

置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置’，景本作‘置’，诸诠音置。”^⑩

④ “徽车轻武，鸿絺緹猎。”

鸿絺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鸿，诸诠胡栋反。絺音恸。”^⑪

⑤ “相与迺虬高原之上。”

迺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诸诠作复迺。复，呼盛反。”^⑫

⑥ “萃僂允溶，淋离廓落，戏八镇而开关。”

① 案：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云“卢本深生作诞生。”则邹深生即邹诞生，《隋书·经籍志》载“《史记音》三卷，梁轻车录事参军邹诞生撰。”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又云“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亦撰《音义》三卷。”故知邹诞生为齐梁时人，曾作《史记音义》。而所谓“褚诠之音”则当出自《百赋音》无疑。陆德明又明言此音为《上林赋》所注，检《上林赋》，“嵌岩”字仅见于“嵌岩倚倾”一句，故“苦衔反”恐当为此处所注。

② 案“萧该《音义》”即两《唐志》所载之萧该《汉书音》十二卷。

③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25页。

④⑤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26页。

⑥⑦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27页。

⑧⑨⑩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30页。

⑪⑫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31页。

允溶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允，诸注音余永反。溶音勇。”^①

⑦ “秋秋踉踉，入西园，切神光。”

秋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又诸注‘秋’作口旁秋。”^②

⑧ “森泣雷厉，驥駢駢磕。”

驥、磕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驥，诸注作石旁宾。磕，诸注苦盖反。”^③

⑨ “羨漫半散，萧条数千万里外。”

半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半，诸注音叛。”^④

⑩ “东西南北，骋耆奔欲。”

耆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耆，诸注音市至反。”^⑤

⑪ “挖苍豨，跋犀犛，蹶浮麋。”

蹶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蹶，诸注居卫反。”^⑥

⑫ “三军茫然，穷冗阒与。”

冗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冗，诸注余肿反。”^⑦

⑬ “熊罴之挈攫，虎豹之凌遽。”

挈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挈，诸注奴加反。”^⑧

⑭ “探岩排碛，薄索蛟螭。”

薄索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薄索，诸注上音博，下音桑各反。”^⑨

4. 扬雄《长杨赋》

① “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

射 《汉书·扬雄传》录有此赋。《汉书考正》引宋祁曰“射，诸注音食射反。”^⑩

② “搯熊罴，挖豪猪。”

挖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挖，诸注音他。”^⑪

③ “横巨海，票昆仑。”

票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票，诸注音匹妙反。”^⑫

④ “乃展民之所讙，振民之所乏。”

讙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诸注曰‘讙，古屈字。’”^⑬

⑤ “皆稽顙树颌，扶服蛾伏。”

服 《汉书考正》引宋祁曰“服，诸注音扶北反。”^⑭

5. 班固《幽通赋》

① “吻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犹未察。”

吻 《汉书·叙传》录有此赋。《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诸注方味反。”^⑮

② “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讖以臆对。”

讖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该案，诸注音楚鸩反。”^⑯

③ “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盗乱为赖道。”

行行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行行，诸注音胡浪反。”^⑰

①②③④⑤⑥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31页。

⑦⑧⑨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32页。

⑩⑪⑫⑬⑭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33页。

⑮⑯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60页。

⑰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61页。

④ “道悠长而世短兮，夤冥默而不周。”

夤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夤冥，晋灼曰夤音目夤夤而丧精，呵县反。该案，目夤夤而丧精，出王延寿《灵光殿赋》。诸詮音呼政反。”^①

⑤ “胥仍物而鬼讷兮，乃穷宙而达幽。”

讷 《汉书考正》引萧该《音义》曰“讷……诸詮祖侯反。”^②

6. 张衡《西京赋》：“神明崛其特起，并幹叠而百增。”

幹 《庄子·秋水》“出跳梁乎并幹之上，入休乎缺斨之崖”，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并干……诸詮之音《西京赋》作韩音。”（《经典释文》，第383页）^③

7. 潘岳《射雉赋》：“捫降丘以驰敌，虽形隐而草动。”

捫 《文选·射雉赋》此句下徐爱注云“捫，一本或作捫。”^④《周南·葛覃》“薄汙我私”，毛《传》“汙，烦也”，郑《笺》“烦，烦捫之用功深”，陆德明《经典释文》云“捫，诸詮之音而专反。”（《经典释文》，第54页）^⑤

8. 左思《蜀都赋》：“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燭飞煽于天垂。”

燭：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九《大智度论》第十八卷“燭睹”条下注云“《声类》作燭……《论文》作燭，案《说文》、诸詮之《蜀都赋音》皆余贍反。”^⑥

据初步统计，散见于各种古注中之《百赋音》条目如下表所示：

（表1） 各种古注所引《百赋音》总表

序号	作者	篇名	出处	条数	字数
1	司马相如	《天子游猎赋》	《史记索隐》《经典释文》	2	2
2	扬雄	《甘泉赋》	《汉书音义》、宋祁注《汉书》	5	6
3	扬雄	《羽猎赋》	《汉书音义》、宋祁注《汉书》	14	18
4	扬雄	《长杨赋》	宋祁注《汉书》	5	5
5	班固	《幽通赋》	《汉书音义》	5	5
6	张衡	《西京赋》	《经典释文》	1	1
7	潘岳	《射雉赋》	《经典释文》	1	1
8	左思	《蜀都赋》	《一切经音义》	1	1
总计	6	8	5	34	39

据〔表1〕可知，从《史记索隐》《经典释文》等5部文献中共辑出《百赋音》中涉及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潘岳、左思等6人计8篇赋作的音义训释共34条，39字。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征引《百赋音》的文献均为经典之作，在学术史上都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①② 《汉书考正》，《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第161页。

③ 案：陆德明言此为《西京赋》中之音，而《西京赋》“并干”连用者只此一句。

④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141页。

⑤ 案：检齐梁前能见诸赋，“捫”字仅见于《射雉赋》此句之“或本”异文，故疑当为此处之注音。

⑥ 释玄应《一切经音义》，《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41册，第423页。案：扬雄《蜀都赋》既无“燭”字，亦无“燭”字，而左思《蜀都赋》“燭”字则一见，故疑当为此处之注音。

陆德明、司马贞、萧该、宋祁、释玄应亦皆一时大家。他们对《百赋音》的引用，说明了他们对褚诎之的肯定与推崇。即使颜之推曾批评当时的学者“信褚诎而忽吕忱”，但恰恰反映了褚诎之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因此，《百赋音》的音义训释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被认为是权威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学说，体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这种权威性与价值也正体现在其内容体例与学术传统之中。

二 《百赋音》的内容体例与六朝音义学传统

通过前文对《百赋音》佚文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其内容包括注音和罗列异文。其中，注音 37 字，异文 9 字，因有既列异文又注音者，故总数超出了上表所统计的 39 字。这与之后的《楚辞音》《经典释文》等一致，当是六朝音义文献的内容和体例。如敦煌残卷《楚辞音》即从《离骚》正文与王逸《章句》中依次摘字注音。又如《论语·颜渊》“吾焉得而食诸”，《经典释文》卷二四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诸’”（《经典释文》，第 351 页），则是记录各本异同的内容。因此音义文献本来就是“一种随文注释或逐句摘字为释的通过注音的方式来解释字义、说明字词用法的文献，还包括文字订正和文本校勘等内容”^①。而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的是其中的注音部分。

首先，从注音方式上来看，在本文辑出的《百赋音》佚文中，注音共 37 字，包括直音注音 10 字、反切注音 26 字和古某字 1 字。这表现了当时注音方式的多种多样以及直音逐渐发展为反切注音的过程。

在音义学史上，直音注音的出现比反切注音更早，汉末服虔、应劭等人的反切注音也只是偶一为之^②，真正将反切注音在学界普遍推广的，是受业于郑玄的孙炎。不过，直音的运用并不因为反切的出现就迅速消退了。有人曾对胡小石先生所辑郭璞《楚辞注》佚文进行分析并从中总结出 6 条确实可用作《楚辞》的注音，其中直音就有 5 条之多，反切仅 1 例，可见东晋郭璞的注音仍以直音为主。但在敦煌残卷《楚辞音》中，305 字就有 236 字运用了反切注音，这说明到了敦煌残卷《楚辞音》的时代，反切注音才真正得到极大的推广^③。而《百赋音》佚文注音 37 字，有 10 字为直音，占到四分之一还多的比例，正好居于郭璞《楚辞注》和敦煌残卷《楚辞音》之间。因此，从郭璞《楚辞注》到褚诎之《百赋音》，再到敦煌残卷《楚辞音》，直音在注音中运用频率和比例的逐渐下降，说明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义训释中直音逐步被反切注音所代替的事实，也印证了陆德明“然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渐繁”（《经典释文》，第 2 页）的论断。

其次，从语音系统来看，《百赋音》的直音注音也基本与《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相同，这不仅符合六朝旧音独有的特点，也说明《百赋音》注音使用的大概是当时南方的共同语，因而能够得到极大的认可和推广。

现将前文提到《百赋音》中的 10 处直音以及它们各自在韵书中的注音列表如下：

① 参见拙文《楚辞音义文献研究》，四川师范大学 2017 年博士论文，第 18 页。

② 案：据《颜氏家训·音辞》云“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则可知东汉时已有直音，而反切注音当始于汉末服虔、应劭等人。如《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梓潼”，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泱反。”

③ 关于郭璞《楚辞注》与敦煌残卷《楚辞音》的注音统计均可参见《楚辞音义文献研究》，第 78—79 页。

(表2) 被音字和直音注音对照表

被音字	《广韵》注音	直音	《广韵》注音
僂	息移切; 直离切; 除尔切	池; 豸	直离切; 池尔切
绎	羊益切	亦	羊益切
綯	徒红切; 徒弄切	恸	徒弄切
溶	余封切; 余陇切	勇	余陇切
扞	托何切; 徒可切	他	托何切
半	博慢切	叛	薄半切
薄	傍各切	博	补各切
幹	古案切	韩	胡安切
置	陟吏切	置	子邪切
糝	居虬切	株	陟输切

如(表2)所示,前五组被音字与直音所用字在韵书中的注音均完全相同。除直音外,《百赋音》的26例反切注音中也有14字与《广韵》所注并无实际区别。如“嵌”字,褚诎之注为“苦啣反”^①,《广韵》音“口衔切”^②,均读作溪母衔韵。又如“讖”字,褚诎之注为“楚鸠反”,《广韵》音“楚谮切”(《宋本广韵》,第421页),均为初母沁韵。类似之例实多,兹不赘举。这里还要特别提到“讖,古屈字”,这其实也可看作一种直音注音,而“讖”“屈”二字亦同为溪母物韵字。

也有个别字在韵书中不止一个读音,但每一个读音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字义。如“僂”字,《广韵》有三音,一是“息移切”,属支韵,意为“僂祁,地名,在绛西临汾水”(《宋本广韵》,第28页);二是“直离切”,亦属支韵,意为“僂僂,参差也”(《宋本广韵》,第29页);三是“除尔切”,属纸韵,意亦是“僂僂,参差兑”(《宋本广韵》,第224页)。而其直音“池”《广韵》音“直离切”(《宋本广韵》,第29页)，“豸”《广韵》音“池尔切”(《宋本广韵》,第224页),与“僂”一音“除尔切”俱为澄母纸韵字。又《甘泉赋》中的“僂僂”正是参差之意,故褚诎之以“池”“豸”二字为“僂”字注音颇为恰当。能够根据字义选择不同的注音,这在褚诎之的反切注音中也可常常见到。如“索”字,《广韵》有三音:一属铎韵,“尽也,散也,又绳索,亦姓,出燉煌,苏各切”(《宋本广韵》,第487页);二属陌韵,“求也,山戟切”(《宋本广韵》,第490页);三属麦韵,“山责切,求也,取也”(《宋本广韵》,第495页)。而《羽猎赋》中“薄索蛟螭”之“索”,褚诎之注为“桑各反”,则与“苏各切”同为心母铎韵,这意味着褚诎之认为此处之“索”当作以绳索捆绑之意。又如“隄”字,《广韵》有二音:一属卦韵,“乌懈切,阻塞,又隄嶰,山形,或与隘同”(《宋本广韵》,第363页);二属麦韵,“於革切,限也,碍也,又危也,塞也”(《宋本广韵》,第495页)。而《羽猎赋》“陋三王之隄薛”之“隄”,褚诎之注为“乌隔反,一音於卖反”。“乌隔反”与“於革切”同为影母麦韵,“於卖反”与“乌懈切”同为影母卦韵,褚诎之二音俱用,当是认为赋中“隄薛”即“隄嶰”,以状山之形,同时当又有障碍阻塞之意。类似之例亦多。可见,褚诎之的韵学功底其实相当深厚,其注音颇能代表中古语音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体现出了以注音区别字义和字词用法的倾向,这不仅体现了六朝音义文献的传统,也与当时经师解经有“破读”的文化现象有关。

① 案:啣,即衔字。

② 陈彭年《宋本广韵》,中国书店1982年版,第211页。

所谓“破读”即无论罗列异文还是列举诸家注音，其目的都是为了解释这个字的意义和用法。或者说，它表明了经典中的某处之所以要写作某个字或要给某个字注为某个音，就是因为这个字和注音表示了这个字的用法和含义。不过，也有学者怀疑这种现象是六朝经师“强生分别”的结果^①。其实，一字有两读或多读在《说文解字》与《释名》中已经大量出现，这是汉字产生之初早已存在的现象，是由于一物或有多个特征，或者一音亦可表示多个特征造成的^②。所以，用注音来区分字义和用法并非六朝经师的创造发明，而是汉字这种表意体系的文字一直以来就具有的特点。

当然，除与韵书相同的注音而外，褚诎之的注音与韵书不同者更加值得关注。这些不同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音不同，但相近。如褚诎之音“半”为“叛”。“半”《广韵》音“博慢切”（《宋本广韵》，第384页），“叛”《广韵》音“薄半切”（《宋本广韵》，第384页），二者一为帮母换韵字，一为並母换韵字，读音实际很接近。又如褚诎之音“薄”为“博”。“薄”依《广韵》当音“傍各切”（《宋本广韵》，第487页），“博”为“补各切”（《宋本广韵》，第488页），二字亦是声母不同。一为並母，一为帮母，同为重唇音，只是清浊有别，故二音极为相近，乃一声之转。又如“拏”，《广韵》中属娘母麻韵（《宋本广韵》，第146页），褚诎之音“奴加反”，为泥母麻韵，娘、泥二纽相通。此亦其类也。

第二，平声、去声混用。如“幹”，《广韵》音“古案切”（《宋本广韵》，第381页），属去声翰韵，褚诎之音“韩”，属平声寒韵。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褚诎之的读音里，在其他六朝学者的音切系统中也同样普遍。从《经典释文》所引六朝学者的注音中我们就可发现端倪。蒋希文在研究以徐邈为代表的六朝语音系统时就曾提到“《广韵》的平声字和去声字在徐邈的读音里常有混切。”^③这说明，虽然晋宋间平上去入四声早已存在，但声调对于语音和语法的表达作用还并未如后世一般重要。这也是当时语音实际情况的一种表现。

第三，用注音的方式改订被音字。《百赋音》的佚文中除了有“秋作口旁秋”“驪作石旁宾”之类直接记录异文的条目而外，还有诸如“置，诸诎音置”之类通过注音来改订文字的内容。《说文·网部》：“置，兔网也。”^④《羽猎赋》“营合围会，然后先置虚白杨之南”之“置”，张晏曰“先置，供具于前也。”（《文选》，上册，第131页）褚诎之读为“置”，则说明他认为此处“置”当作“置”，即先设捕兔之网于白杨观之南，与《羽猎赋》描写之畋猎场面亦相合。又如《上林赋》“嵌岩倚倾”之“嵌”，褚诎之音“苦衔反”。然依《广韵》，“嵌”当读作“去金切”（《宋本广韵》，第199页），为溪母侵韵，意为山崖高峻之貌。而“苦衔反”属溪母衔韵，当是“嵌”字之读音。《玉篇·山部》“嵌，坎傍孔也，又山岩”^⑤，与《上林赋》文意亦相符。因此，这实际是保存异文的一种方式，也符合颜师古对褚诎之读相如赋“改易文字，竟为音说”（《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第8册，第2529页）的评价。而据蒋希文的研究，这种“依据师儒故训或依据别本、古本，用注音的方式改订经籍中的被音字”（《徐邈反切系统中特殊音切举例》）的方式本身也是六朝学者惯用的一种方法。

总的来讲，褚诎之《百赋音》的内容体例基本体现了六朝音义文献的传统，在注音的同时，也注意保存和甄别异文，甚至还有以注音来改订被音字的现象，这都与六朝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紧密相关，亦为后世《楚辞音》《经典释文》等经典音义文献所借鉴、继承。只是尚未发现《百赋音》解释文意的内容，此与《经典释文》等小异。同时，褚诎之的音韵学功底深厚，其注音运用的是当时的南朝

① 案：如顾炎武在《音学五书·音论》中就认为“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去入之别，不过发言轻重之间，而非有此疆尔界之分也”。

② 汤炳正《〈说文〉歧读考源》，《语言之起源》，台湾贵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17—178页。

③ 蒋希文《徐邈反切系统中特殊音切举例》，《中国语文》1994年第3期。

④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⑤ 顾野王《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404页。

“正音”，基本可以反映六朝语音的真实情况，这是难能可贵的，或许这也正是其音注被时人及后世学者所广泛认同的原因之一。

三 《百赋音》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一种学术著作的出现，总有着待以解决的学术问题的当下需要，而《百赋音》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种需求之上。

第一，《百赋音》的出现与赋集的出现相为表里，凸显了音义学的经学源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和文学音义的独立发展。

对于《百赋音》这一书名，如果不看内容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为单篇《百赋》所作的音义，二是为一百篇赋或大约由百篇赋所组成的文集所作的音义，二者截然不同。当然，从前文对《百赋音》佚文的钩索来看，其书至少已经包含司马相如、扬雄等6位文人的8篇赋作，因此绝不会是为题为《百赋》的单篇赋作注音。这就涉及到为赋结集的相关问题。

关于赋集的出现和编纂，世有异说。章学诚在《校讎通义·汉志诗赋》中谈到《汉书·艺文志》对于屈原、陆贾和荀子三家赋的著录是“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又说“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①。先秦两汉的著述多单篇别行，《汉志》只是将其按类著录，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赋集。真正的赋集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如《隋志》所载“《赋集》九十二卷，谢灵运撰。梁又有《赋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赋集》四十卷，宋明帝撰”（《隋书》卷三五《经籍志》，第4册，第1082页）等。许结曾撰文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选集包括赋集编纂兴起的四个原因：一是经学的兴废，二是文学观念的确立，三是“以史传文”传统的衰落，四是文学辨体意识的凸现^②。正是因为文学观念的逐步觉醒，使得文学从经学的附庸中独立出来，而专门的作家群体扩大，作品增多，史书逐渐难以胜任载录文章的职责，才会出现纯文学文献的归类与整理。换句话说，只有纯文学的观念得以确立，才会出现专门研究纯文学的学术著作。南朝宋褚诠之的《百赋音》正是随赋集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最早关于赋集的音义训释专著。虽然在此之前还有李轨《二都赋音》、綦毋邃《二京赋音》存在，但它们顶多也只能算是对单篇或两篇赋所作的音注，在性质和规模上都与《百赋音》有着不小的差异。《百赋音》的撰作恰好与赋集的编纂和兴起同时，或者说它就是伴随着大型赋集出现和传播的产物，颇可一窥当时文学独立的学术思潮。

但中国古代的文学毕竟是从经学中脱胎而来的，因而早期的文学讲解和传播都还不可避免地带上经学的烙印。《隋志》所载年代最早的音义文献如嵇康《春秋左氏传音》、徐邈《周易音》《古文尚书音》等均是经学著作，与传、注、章句等共同构成了形式多样的经学文献。因而前文提到的《百赋音》所采用的摘字为释的训解方式以及注音中表现出的“破读”等现象，无不带有经学传授的影子。这也是文学从经学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门之初所不可避免的，体现出的不仅是文学独立的过程，也有音义之学的学术渊源。在文学独立之后，音义文献也突破经史传授的藩篱，作为一种研究和传播手段在文学领域继续发展与演变，并逐步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项专门之学。仅从《隋志》所载来看，除《百赋音》而外，《楚辞》《文选》以及各种赋集均有音义文献传世，姜亮夫先生更是在《楚辞书目五种》中单列“音义”一类，足可见源于经学的音义也在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百赋音》展现了当时辞赋音义的发展水平，帮助了时人诵读和理解辞赋，客观上还为学生作赋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赋韵，扩大了辞赋的传播范围，也保存了诸多异文异说。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下册，第1239页。

^② 许结《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人们对于辞赋诵读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如《汉书·王褒传》中汉宣帝诏征九江被公诵读楚辞，以及太子有疾，为诵王褒辞赋，太子疾愈之事，都是关于时人诵读辞赋的记载。赋本身可诵，加之又多用奇字，增加了诵读的难度。因此通过注音能够清楚地明白辞赋语境中的字音字义自然就是音义文献的首要作用之一。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百赋音》的音注无论是在声纽、韵类还是声调的运用上都颇能体现六朝语音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音义学的发展水平，故而褚诠之的学说才能成为一时的权威经典，甚至影响到后世的学者。而在韵书尚未出现和普及的时代，学者亦可从辞赋音义的注解中寻绎出赋韵，为习赋、作赋作一参照。

同时，为方便辞赋在民间的传播，让文化程度一般的人都能诵赋，也是《百赋音》这类辞赋音义文献的重要价值。在《百赋音》的佚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为“儻”“冢”等罕见字注音，也会为“齐”“半”等常见字注音，其目的就是为辅助理解与诵读并扩大辞赋的传播范围，使得辞赋得以真正从宫廷走向民间。而这些注音，尤其是通过注音来改被音字的方式，在客观上还起到了保存异文异说的作用。如《上林赋》褚诠之读“嵌”若“嵌”，《羽猎赋》读“置”为“置”等，皆其例。六朝时期既然还处在学问口传的时代，师徒间的口头授受就必须依靠准确的语言表达才能实现。《百赋音》中以注音的方式改订被音字的现象，正与六朝经师传授学问时的“破读”一脉相承，就是为接受者可以充分理解文意服务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异文，又多是由各自所学的各家师说和别本所造成的，所以，同时它也起到了传承师说和一家之学的作用。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时提到徐广、褚诠之等人皆有关于司马相如诸赋的音义学说之后，又说“今依《班书》旧文为正，于彼数家，并无取焉。”（《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上》，第8册，第2529页）这也可见当时异文异说之多，而颜师古为了保留一个完整而权威的版本，于是尽弃诸说，以班固《汉书》所录版本为正。

第三，《百赋音》显示了音义文献由零散的注音向集中展现音义训释的演进，启发了后世利用这种形式逐步建立起系统专门的音义学说和理论。

虽然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百赋音》佚文都是散见于各种古注之中，但《隋志》和两《唐志》等书目文献的明确记载还是证明它曾以专书的形式存在。最早关于辞赋的音义注释几乎都是零散出现，如见于应劭等人对《汉书》的注解或郭璞《楚辞注》中的注音，后来才逐步发展为《经典释文》一类的音义文献专著。但《经典释文》一书至南宋初方有刻本流传，单行本却很少见。宋刻诸经，多将《释文》附于卷末，也有将《释文》中的各字音义散入章句之中的^①。这似乎可以说明《经典释文》一书最初普遍的流传方式是附于诸经之后，甚至随文注释，并非别本单行。而在敦煌卷子中，除有《楚辞音》残卷这种单行的音义文献形态以外，也有如S. 3663《文选》残卷^②一类的在文中字里行间随处标注字音的文献形态。这应当与经学的传注形式有关，因为“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③。所以无论是随文注释还是别本单行，学习的都是汉代注经的方式，在再次证实了音义文献的经学渊源的同时，也可以说明音义文献应与其所注释的文献配合阅读，而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读者读通经传，因此可以说早期的音义文献都是从辅助文献识读开始的。

但《百赋音》这种专书形式的音义文献将零散琐碎的音义注释整合在一起，不仅依然能发挥辅助识读文献的功能，还能集中展现随文识读文献所记录的语言现象，使得学者可以借助它们从中发现不足和规律，从而逐步形成系统的音义学说。虽然还不能说褚诠之作《百赋音》时就有构建系统学说的

① 案《宋史·艺文志》所载既有单行本的“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又有附列于各经之后的“陆德明《释文》”，如“《易》类”有“陆德明《释文》一卷”，“《论语》类”亦有“陆德明《释文》一卷”等。

② 案：残存成公绥《啸赋》部分。

③ 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269页。

目的，但我们确实能从他的音注中发现並母、帮母不分，平、去声混用等现象，从而窥见六朝语音的部分真实面貌。尤其是以注音明义的方法或可视为清代学者音义互证学说之渊源，因为它们都表现出了对汉字音、形、义之间关系的理解和研究。所不同的是，以褚诎之为代表的六朝学者只是发现利用文字的不同读音可以区别字义，于是将其运用到了学术实践中，而清代学者则更是在这一语言现象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了相关学说。这当然是一种学术方法和理论逐步发展和建立的过程，但他们对汉字音、形、义的关注则是一脉相承的。

四 《百赋音》的散佚及其原因

既然《百赋音》曾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又为何会散佚得如此之快呢？据现存史料来看，自《通志》之后，历代公私书目均未著录《百赋音》，其书盖亡于两宋之交。两宋之际，战乱频繁，是书极有可能遭遇兵燹。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宋代刻书业兴起以前，图书的传播均主要依靠手抄。《百赋音》虽然曾在赋学领域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毕竟使用范围较窄，传抄的群体有限，历时既久，自然存在散佚的风险。除此之外，《百赋音》的散佚当然还与音义文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关。

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唐代以后音义之学与小学的混同。有学者认为音义文献是“小学书体式的‘音义体’”^①，但通过对《百赋音》这类音义文献的内容、体例和作用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与字书、韵书等小学体式的文献其实有着明显的不同。音韵学中的韵书主要为文字的日常使用注音（如写诗作赋等），集中表现出的是某一时代的语言特点和语音系统，如《广韵》《集韵》等表现出的就是中古音。而音义则是为文献注音释义，为的是临文诵读和理解文意。这些注音往往又由于师说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它反映出的就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现象，而是学术的传承。同样的，文字学著作中的释义是为了分析字形求得本义。而音义文献中释义却是伴随着注音而来，是因声求义，所以才又辅以异文异说的甄别考订来说明音义文献的经学本质。

六朝时期的学者对音义文献与字书、韵书的区别起初应该是很清楚的。方孝岳就说“二者之别，六朝人知之甚明。故颜之推《家训》一书既有《音辞篇》复有《书证篇》，二篇皆论音韵，而前者言韵书，后者言书音，其为界域故自分明。”^②这说明音义之学与文字、声韵之学的混淆是后来才产生的。

现在能看到最早对音义文献进行学术归类的还是《隋书·经籍志》。其云“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诸书。”（《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4册，第946—947页）很明显，《隋书·经籍志》将训诂、音义、声韵并立，即说明当时的学者认为这是三种不同的学问。更为清晰的是在《隋书·经籍志》中，音义文献并未归入“小学类”，而是分别归于各部典籍之中，类同于各部典籍的传注。如《礼音》就入“经部礼类”，《史记音义》就入“史部正史类”，《庄子内篇音义》就入“子部道家类”，《楚辞音》就入“集部楚辞类”。可见，当时的学者是把音义文献和典籍传注等同看待的。所以，此时音义文献的注音释义仍然还是各类作品尤其是经史文献的附庸。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经典释文》归入“经部经解类”，犹存古法。他还言道“案前世《艺文志》列于经解类。《中兴书目》始入之小学，非也。”^③两《唐书》中，《经典释文》确实分别列入“经解类”和“七经别解类”。而《宋史·艺文志》中，单行本的《经典释文》著录于“经解类”中，复又重见于“小学类”，

① 于亭《论“音义”体及其流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

② 方孝岳《论〈经典释文〉的音切和版本》，《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③ 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上册，第81页。

可知六朝时音义与训诂、声韵界限分明，唐代尚能区分，而宋代即已混而为一，不能辨明。

因此，音义之学最初并非属于小学，而是一门经学传授过程中的独立学问。而音义之学与小学的这种混同直接消解了音义文献在学术口传的时代中秉承师说和一家之学的痕迹与内涵。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卷一《序录·条例》中辨析一个字各种读音所代表的意义和用法时曾言道“余承师说，皆辨析之。”（《经典释文》，第3页）又，陆氏在是书的《序录·序》中谈到《经典释文》的撰作目的时还明确说道“示传一家之学，用贻后嗣，令奉以周旋，不敢坠失。”（《经典释文》，第1页）这里的“承师说”和“示传一家之学”，都表明了陆德明撰作《经典释文》一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自己所师承的学说传播下去。其注音、释义、订正文字的标准其实都是自己所承袭的“师说”，传播的是自己所认可的“一家之学”。可见，直至唐初，经师间的师授传统仍然被秉承。而音义与小学的混同，尤其是字书、韵书的大量出现却使得“一家之学”的特殊性渐渐开始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标准，书面传播逐步囊括了“师说”口授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音义文献最初的精神内涵即渐趋式微。

其次，音义文献记录字音的作用也逐渐被韵书所取代。音义文献在辅助诵读理解经典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记录字音的作用，但这种字音的记录伴随着经典文献语境的特定性。韵书则不同，它记录的字音更具有广泛性。韵书的出现虽不在唐代，但在唐代却迅速成为普遍流传和运用的工具书，这跟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制度紧密相关。

唐宋时期的进士科取士，虽屡有更改，但均主要试以文辞，尤其是诗赋。而当时的诗赋创作都有严格的格律要求，于是催生了韵书的推广和发达。《广韵》即为宋代据《切韵》和《唐韵》重修的一部官方韵书，从中颇可以看出韵书与诗赋取士之间的相互影响。以诗赋取士不再要求士子对于经史高标准的掌握，也不需要对于经史的义理有何深刻的见解，最重要的是如何迅速并高水平地写出合格的诗赋，所以韵书在当时本就是为方便士子们应试而出现的一种工具。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大宋重修广韵牒》更是明确要求《广韵》一书“宜令崇文院雕印送国子监依《九经》书例施行”^①。韵书的编撰体例是以声调统率韵部，以韵部统率各部中的字，实际上就是按韵编排的字典。这样就将同声、同韵、同调的字都依类归在一起，方便人们查考字音、字义，尤其是在创作诗赋时查找同韵脚的字就会特别便捷。除注明字音外，《广韵》还罗列每个字的各种义项，并举以典故来方便士子选用。《广韵》共分206韵，每一韵都标明了独用或可与某韵同用，这显然也是为士子创作诗赋服务的。又据《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载“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其挟书为奸，及口相授者，发觉即黜之。”^②可知宋代考试时可以携带的书籍，就只有韵书和字书。这些都必将对于韵书、字书在社会上的推广产生影响。而由于韵书查考字音、字义的便捷，使得音义文献本身具备的帮助诵读的功能也被边缘化，加之在指导辞赋创作的用韵方面，韵书更比音义文献直观可靠，以致音义文献记录字音的作用逐渐被韵书所取代。

因此，韵书的出现和推广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音义文献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侵蚀了其生存的土壤，消解了其最初的精神内涵。自唐代以后，音义文献数量就开始锐减。《隋书·经籍志》载录以音、音义、音训等为名的文献共计有九十余种，《旧唐书·经籍志》载录五十余种，《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则超过六十种，而《宋史·艺文志》仅见载录二十余种，《明史·艺文志》更是只有五种，但如杨慎《转注古音略》、陈第《毛诗古音考》等专注于音韵学研究的著作却开始涌现。从学术史上来讲，音义学属于传统语文学的范畴，其目的是为了帮助阅读、理解文献中字词的读音和语义。而小学中的音韵学则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其目的是研究和阐述一个语音系统。语言学是在语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音韵学自然也源自音义学。从这个角度来看，唐代之后音义之学与小学的混同实则是中国传统

① 周祖谟校《广韵校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册，第3605页。

的语文学向语言学发展演变的表现。

虽然音韵学替代音义学的部分功能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但音义文献并未真正消亡过。除各类典籍中仍不乏注音而外，直到清代也还有汪梧凤《屈原赋音义》、余萧客《文选音义》等音义文献专书问世，这也说明了音义文献的特殊价值一直被学界认可，主要又表现为对其辅助阅读这一功能的肯定。

韵书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音义文献记录字音的作用，但却无法代替其在特定文献、特殊语境中注音的直观性和准确性。因为汉字往往一字多音，每一读音均可表示不同字义，当具体到某篇某字之时，该选取何种读音就是一个需要斟酌考虑的问题。相比在遇到读音问题再去查阅韵书，随文注释或摘字为释的音义文献无疑更为直观精准。另外，韵书只能记录某一时代的字音，但却无法解决在阅读过程中所遇到的古今音变带来的失韵问题。如唐宋后之学人阅读《诗经》《楚辞》，若依《切韵》《广韵》为准，则必感失韵之处甚多，因而朱熹等人竟为音注，虽不免落入叶韵窠臼，但毕竟是尝试解决韵书不能解决的问题。清代乾嘉之后的学者所作之《诗经韵谱》《楚辞韵谱》等即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系统性探索，这更是音义文献的重大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褚诠之《百赋音》虽已散佚，但仍可从《经典释文》及《史》《汉》旧注等文献中辑出34条，分别涉及司马相如等6人的8篇赋作。《百赋音》在注音的同时，还注意了异文的保存和甄别，也有通过注音来改订被音字的现象，这都与六朝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相关，也为后世音义文献所借鉴。尤其是其注音运用了当时南朝的“正音”，基本可以反映六朝语音的真实情况，因而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广泛认同。《百赋音》与赋集的编纂相配合，凸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文学音义从经学中独立与发展的状况，代表了当时辞赋音义文献的水平，不仅可以帮助诵读和理解辞赋，还提供了可供学习参考的赋韵，扩大了辞赋的传播范围。更重要的是，《百赋音》的出现显示了音义文献由零散注音向集中展现语言现象的演进轨迹，启发了后世学者逐步建立系统专门的音义学说和理论。而它的散佚除了由于自身使用范围较窄，在图书依靠手抄流传的时代不易传播，以及两宋之交的战乱因素以外，还与音义文献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相关。唐代以后音义学与小学的混同破坏了其传承师说和一家之学的内涵，随着韵书的出现和推广其记录字音的作用也被部分替代，这是音义学向音韵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对于特定文献和特殊语境中的注音，以《百赋音》为代表的音义文献仍然更为直观准确，尤其是它们在解决古今音变带来的语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跨越一时一地语音限制的优越性，更是韵书无法取代的。

[作者简介] 牟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等。

(责任编辑 孙少华)